

百年

百年
敦煌

敦煌

维青之 著

敦煌亚洲的十字路口

王道士、藏经洞的发现者，功过待后人评说
斯坦因、涉足中亚，九死一生，修成考古、学术正果
伯希和、六国饭店一席经，惊醒东西世界，创立了「敦煌学」



《百年敦煌》正本清源，使我们认识敦煌、展示敦煌历史画卷、曝光莫高人生秉性

全新的学术观点，严肃的专业态度，回顾、自省、反思、疾呼



百年敦煌

雒青之 / 著

✿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敦煌 / 雒青之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468-0925-0

I. ①百… II. ①雒… III. ①敦煌学—文化史—研究
IV. ①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5526号

百年敦煌

雒青之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封面题字: 徐祖藩

责任编辑: 王忠民 靳 莉

装帧设计: 锦色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深圳市金豪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30千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978-7-5468-0925-0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敦煌：从学术伤心史走向世界显学

——重读雒青之《百年敦煌》心灵倾诉

谢武战

《百年敦煌》从初版到现在，整整经历了十八个年头的喧哗和平静、淘漉和磨砺，让一部本不是奇书的著作始终在关注敦煌的人们眼窝里循环往复。各种批评的声音涌动着真诚和善意，即使粗粝的批判也是一种别样的雕琢。蜂拥而来的更多智慧的滋润和文化的考量，却是这部著作不因时光老去的保鲜因素。

《百年敦煌》之前之后，有不计其数的关于敦煌的著作和文章，但似乎都没有这部书引起的争议大，同一时期还有许多以文学和文艺形式演绎或虚构敦煌的作品，似乎也波澜不惊。唯独《百年敦煌》成为不一样的烟火，好评如织，恶评糅杂，争鸣在耳，争锋入目。主要的焦点集中在书中力图澄清的三个历史人物身上：一个是渺小而可怜的王道士，一个是“盗亦有道”的考古泰斗斯坦因，还有一个是学贯东西方的学术大师伯希和。这三个本不搭界的、命运各自不同的人物，奇妙地出现在亚洲的十字路口，交汇在敦煌的历史转折点上。

《百年敦煌》之所以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活力点，并不是作者雒青之发出了“向我开炮”的声音，而是他在十八年前没有任何征兆地，为三个被舆论一边倒斥为“盗贼”的人物说了几句公道话，便引来络绎不绝的冲击波。其实，拿到今天来看，在一个相对开放、开明和开诚布公的社会背景和舆论环境中，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的历史评价都可以做到平心静气、轻言细语。事实上，雒青之当年也不是先知先觉要用一己之力填平历史洼地，他也并没有表现出来异乎寻常的学术敏锐性和精神层面的锋芒毕露，按他当年自己的话说：“学术问题也是要有足够的感觉和足够的坚持的，并不一定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但必须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百年敦煌》的写作初衷。我所知道的雒青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甘肃作家，有着超强的理论思维和审美精神，他对敦煌的思考和发现由来已久，并形成了四个比较顽固的关注点：一是敦煌的历史生态系统的构成和延续；二是丝绸之路上为什么是敦煌这片相对不发达的地方成为高不可攀的文化高地；三是恢复敦煌文明的伟大包容性和巨大融合能量有多么难；四是敦煌和敦煌学不是什么碎片化的资源利用，而是系统化的人文精神再造。从这四个方面调动了他的全部视野，让他迅速地踏破铁鞋觅敦煌，在这片漂浮在沙海戈壁上的学术孤岛上发掘着属于敦煌也属于世界的历史文明的纵断面和横断面。十八年前的雒青之无疑是一种选择了一种门槛板高、难度板大的“文化苦旅”。他至今为止都不认为这种剑走偏锋的选择是一种冒险，比起斯坦因将一把老骨头撒在阿富汗以及伯希和永不言败的探索状态，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在自己的故乡的原风景里栽下一棵树，他甚至觉得自己也不如贫困潦倒的王圆箴心甘情愿地凋零在道士塔里陪伴着敦煌莫高窟。所以，写作《百年敦煌》对方兴未艾的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而言，雒青之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不请自到的闯入者，他只想坐在敦煌的怀抱里静静地冥想、倾听岁月的流淌和渗透在敦煌沧桑中的那些抹不去的精神文化痕迹。

毋庸置疑，《百年敦煌》自十八年前匆匆走来，有十个方面的影响力和传力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无法忘却：一是作者对敦煌铭心刻骨的体验性，

让敦煌骨子里的盛大辉煌，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二是作者内心深处累积的见贤思齐和择善而从的历史人物观，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感性视野和理性坚持；三是作者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肃然起敬，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致敬敦煌是作者的文化灵魂；四是作者对敦煌拥有一颗充满敬畏之情的“世界心”，在他心目中只有走向世界，敦煌文化才能走向复兴；五是作者一片冰心在玉壶，对敦煌大地上的事物给予了经久不息的情感滋润；六是作者从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尊重规律的角度，对敦煌重要的标志性发展脉络和关联人物进行了独立思考 and 深度评价，既不人云亦云，也不随心所欲；七是作者重视敦煌文化内涵的历史性阐释和现实性关照，从单向表达延伸到多维探索；八是作者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韧，厘清湮没在时代变迁和敦煌文化走势中的风云际会和是非成败，从尘埃落定处开出心灵花朵；九是作者始终不渝坚守敦煌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差异性、和谐性、开放性和建设性，兼容并包、多赢共享、互联互通、互融互补；十是作者站在丝绸之路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化高地，寻觅敦煌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较早地将敦煌文化的世界性应用和国际化交流放在优先位置，为提升敦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打开了一扇窗口。

《百年敦煌》当年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并不是模糊不清的迷宫和黑箱，但由于历史局限、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的困囿，任何有独立见解的、与司空见惯的教科书式说法不一致的立场观点，都有可能被一巴掌拍死，做一只陌生的蝴蝶需要春天般的破冰的勇气。雏青之能够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扮演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是建立在他对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熟悉和借鉴、他对敦煌文化的理解和自信、他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系统认知和价值判断上的。应该说，他在《百年敦煌》中所表露和积淀的五大观点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出当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导向：其一，敦煌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某种力量一蹴而就的，它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交融交汇的结果，是不同民族文化循环流动、反复交集的结果。其二，承认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世界一流学者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的表现，是敦煌走向世界的文化标志。其三，肯定王道士这样的对敦煌文物发现和保护尽过力的历史人物，任何丑化都是非人道的，小人物的大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其四，独一无二的敦煌学其实就是敦煌文物周游世界后成为“显学”的，国际一流和国内一流的敦煌学研究巨匠，事实上都感恩于全世界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其五，发现敦煌文物是王道士之功，发现敦煌文物价值、进行战略性储备和开发、实施国际化研究应用则是斯坦因与伯希和的旷世贡献，“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并不是坏事。锥青之立足于敦煌文化的历史沿革和深度提炼，多维解读了敦煌文化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延伸，清晰地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多民族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性邂逅所形成的千古奇缘，定位成：丝路文化带和敦煌文化圈。因而，他的这部《百年敦煌》是凝望着敦煌、眼观着故乡、心怀着世界的充满着梦想的一次精神洗礼。

自从百年前历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里首次命名“敦煌学”以来，敦煌，这个让国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学术天堂就成为国内外敦煌学者和汉学家的精神故乡。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敦煌学如果有偶像，那只能是斯坦因和伯希和。也许是陈寅恪先生那句悲叹“敦煌，中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太过沉重，百年来记忆中的敦煌文化发展步履也是沉甸甸的，总也解不开心头的疙瘩。对于敦煌学的研究和敦煌文化的走向，绕不开的历史洼地就是对敦煌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体系和历史评价方法，斯坦因、伯希和乃至王道士烙印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形象，这不仅是应该重新拓荒的一个历史评价的凹谷地带，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荒原。一方面国学家们无不在使用着斯坦因与伯希和留下的保存极为完好的敦煌文物，并享用着两位大师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反复无常地以“魔鬼的化身”“强盗”“窃贼”“掠夺者”的咒语鞭挞着大师的衣钵。这样的障碍，实实在在切割着敦煌文化领域的研究者心态。锥青之能够从历史渊源和文化差异的视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逆袭传统观点，填平历史沟壑，寻觅精神突围，让《百年敦煌》具有了与其他敦煌故事演绎的历史人物完全不一样的浑厚声音。他基于对敦煌文化的复兴信念

和敦煌文化自身特有的包容性，认为有必要给王道士和斯坦因、伯希和建立纪念馆，雕刻塑像，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应有之意。其实，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天起，敦煌已经注定不可能再沉睡于漫漫黄沙之中。幸运的是最早慧眼识珠的是两位乱世之中的绝世人物斯坦因与伯希和，前者于1907年3月16日置身于敦煌，后者也于1908年2月25日和敦煌结缘。有所不同的是，斯坦因侧重于考古发现，伯希和专注于史料研究，但结果是相得益彰，共同向世界宣告了中国西北的敦煌文化之巅。雒青之在《百年敦煌》中对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的所谓颠覆性评价，也许今天看来一点也不冲动，倒是有几份小心翼翼。之所以还能引发轩然大波，恐怕更多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在历史洼地里找不到方向，走不出沼泽。当下的现实情况是：敦煌文化从洼地走向高地，是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丝绸之路重新启航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敦煌文明从区域性板块互动开始向国际化深度融合崛起的必然要求。

《百年敦煌》在过去的十八个年头里经受住各种观点的冲击、各种思潮的博弈，产生了早已超越一部书的影响力，为敦煌文化资源共享和敦煌文化全面复兴牵起了一条充满文化乡愁的纽带，这可能是作者雒青之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善局吧。如果让他再写一部《百年敦煌》，还有没有当年那种置一切毁誉而不顾的原动力，真不好说。但也确实不必说。因为一部流转了十八个年头的非传奇世界、非传说故事的严肃作品，依然能够萦绕在那么多人的心头，依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芒和智慧的能量，就足以证明：老去的是时间的碎片，而不是内心的声音。十八年时光轮转里，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一次次漫过雒青之的心灵空间，甚至也发出过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是灵魂磨砺过的笔墨，心血滋养过的憧憬，总是让他的精神纬度愈发与时代同轴合拍。《百年敦煌》以生命之浆的姿势，摆渡着他对敦煌的世界和世界的敦煌永不泯灭的一往情深！

2015年3月写于兰州

陈德宏

欲说敦煌好困惑

如果我说我曾“数十”次造访过敦煌，可能有些夸张；如果调过来变成“十数”次，可就并非虚言了。自20世纪80年代起，因工作关系，经我陪同前往敦煌参访的中外作家、艺术家、学者不下百人；最多的一年竟去过四次。为此，我夫人戏称我为“敦煌出差专业户”。由此我结识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并采写了报告文学《段文杰的敦煌梦》；也因此，每当与朋友谈起敦煌，我都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大谈壁画如何精美，塑像如何传神，洞窟的型制如何独特，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典籍如何轰动世界……

我自以为了解了敦煌，理解了敦煌，并为敦煌及敦煌学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可是，当仔细读了稚青之赠我的《百年敦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月出版）之后，深深地陷入了困惑，我反复地追问自己：我真的了解敦煌吗？

我真的理解敦煌吗？

困惑之一，是对王道士——王圆篆的认知与评价。

道士王圆篆是藏经洞的发现者。可就是这样一个王道士，在百余年的敦煌研究中，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几乎变成了敦煌与敦煌学的千古罪人，以其“愚蠢”“勾结”“盗卖”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理由就是他以区区 1200（斯坦因 700，伯希和 500）大洋，把大量的典籍文物拱手“送”给了洋人。

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百年敦煌》钩沉历史，抽丝剥茧，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别样的王道士。

统治阶段思想就是统治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大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的臣民，他虽然文化不高，但能凭着对宗教信仰与虔诚（尽管他的宗教思想很混乱，他以道教之身管理佛教圣地即见一斑），自觉地承担起管理、保护、修缮莫高窟的重任，也绝非愚不可及的等闲之辈。因此，基本的社会准则与行为准则还是懂的。所以当他发现藏经洞后，除了保密并严加看管之外，首先想到的就是官府。他选了一些经卷送给当时的敦煌知县严泽，希望官府加以保护；而严泽则毫无反应。1902 年王道士怀着同样的希冀，又选了一些经卷送给新上任县令汪宗翰；而“汪学识很好，对于历史文物有相当认识”，一看便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但也只是“将此事上报甘肃省”或“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一些敦煌卷子、文物和拓片送人”而已。甘肃学台叶昌炽，“他学识渊博，尤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是我国有名的金石家”。他于 1903 年得汪宗翰寄给他的莫高窟石碑拓片、佛像和写经后，虽然从学术上作了一些重要的考证和纪录，并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建议”很好，可谁来执行呢？六七千大洋的运费谁来出呢？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求告无门，于是取之于敦煌，用之于敦煌，便成为王圆篆出卖典籍文物的主要动因。王圆篆对宗教信仰与虔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对莫高窟的管理、保护、维修的热忱也是毋庸置疑的。除了造像之外，王圆篆还参与

或直接完成了“九层楼”“三层楼”“古汉桥”等的修建。补葺大小佛洞，增添壁画，建造厅堂客舍等寺内建筑。诚如其弟子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所述：“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元募资。”二十多万元大洋，放在今天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数；相反，斯坦因、伯希和的1200大洋，倒变成了“小数”——只是王圆篆募集善款的二百分之一。

关键在效果。王圆篆卖给外国人的经书文物，至今没有一件损毁，全部静静地躺在国外的博物馆、科研单位里，供有志于敦煌学研究的学人使用。而流失于国内的，历经灾难，见者极少，十之八九，估计已不存在了。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监守自盗的“李盛铎案”。李盛铎是清末的学部大臣、学者。据罗振玉记载，1910年敦煌文书抵京后，为当时任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昇之子何震彝所滞留，由其岳父李盛铎“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拔其优者二三百卷，而以其余归部”。在这三天三夜的劫难中，除了李盛铎岳婿二人外，参与者还有李盛铎的亲家刘廷琛及亲友若干人。当时李刚从国外归来，尚未外放，暂于学部任职，而刘也为学部大臣，因此二人得以联手行动。

“肥水不流外家田”已为当代经济学所摒弃，那么，“肉烂在锅里”就真的好吗？

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在那山河破碎、社会动荡、官贪民贫、风雨飘摇、国将不国之际，作为一个小人物的王圆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王圆篆与不做为而又贪腐的官员相比，无论是道德操守还是思想认知，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知识的欠缺，王圆篆也曾在保护文物的主观努力下，犯了一些客观上破坏文物的错误，长期为学术界垢病。其实，充其量这也只是好心办了坏事。此类事直至今日不是仍然屡屡发生吗？我们颇有创造性地称其为“交学费”。今人尚且难以完全做到的事，为什么要苛求百年前的一个小人物呢？鉴于此，雒青之建议王圆篆的原籍湖北及其成长地陕西为其建纪念馆，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对王道士于艰难处境的艰难选择表示了解与理解的，并非雒青之专有，只是其他学人的表述比较“委婉”“艺术”而已，没有雒青之那样直截了当。余秋雨在其散文《道士塔》中，出于爱国义愤，设想他于大漠中单枪匹马拦下了斯坦因等人拉载敦煌典籍的大车。之后呢？怎么办？——“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该驰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最后，余秋雨斩钉截铁地写下掷地有声的三个字：“我好恨！”

余秋雨的爱国热忱很感人，也值得嘉许，其散文也完全符合中国散文“凤头”“豹尾”的传统与规范，完全可以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教材。可历史呢？历史是容不得“假设”“如果”的呀！敦煌典籍流失海外这宗公案，岂是一个“我好恨”了得！

有些好心的学者，出于良好的愿望提出了理想化的假设：如果藏经洞发现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好了。对此，《百年敦煌》给出了远非理想但却实际的答案：“如果藏经洞在1949年以后发现，那将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五万多经卷和其他所有文物一件不缺地展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如果真是那样，当然好，但是敦煌学怎么办？那也最起码推迟半个世纪。更糟糕的可能是，藏经洞发现于1966年之后的那十年。特别是该死的藏经洞里90%以上是佛经！”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藏经洞之所以逃过“文革”劫难，实在是得益于敦煌学已成为世界的显学，知名度太高了，上了国家的重点保护名单。否则，后果真难想象。

想想巴米扬大佛的悲惨命运，令人不寒而栗。

《百年敦煌》还列举了1958—1959年、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全国文物屡遭破坏的事例，说明藏经洞斯时发现，前景也未必美妙。其实，在“国家文物法”颁布后的21世纪的今天，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破坏文化遗址、遗存的突出事件还少吗？盗掘古墓、盗窃文物的突出事件还少

吗？

良好的愿望难敌严酷的现实。

困惑之二，是对于斯坦因、伯希和的认知与评价。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斯坦因、伯希和是被我们贴上“强盗”标签的，同王圆篆一起被钉在了我们的历史耻辱柱上。原因就是他们以区区1200大洋买走了数千件藏经洞的典籍、文物。由于意识形态的先入为主及学术上的从众心态，国人对此大多是笃信不疑的。更有甚者，以此为区分“爱国”及“卖国”的界碑。

《百年敦煌》使我们较全面、较真实地认识了斯坦因、伯希和。

毋庸讳言，《百年敦煌》对斯坦因的认知、评价是迥异于我们的传统观点的。对此仅从关于斯坦因的章节的题目——旷世大师斯坦因：一个受洗礼的孩子；中亚探险与考古；“强盗”日记；较量敦煌；垃圾堆里的博士；魂断阿富汗与世界的致敬——便一目了然。

但是如果认为雒青之为了出新、出奇、出怪，一味地为斯氏唱颂歌，那就大错特错了。《百年敦煌》对斯氏一生的成就进行了臧否。“较量敦煌”就为我们叙写了一场精彩的攻防战——西方的大学者急于得到经书、文物，老谋深算，探藏不露；东方的小道士，奇货可居，若即若离，不急不躁。几经攻防，来回较量，斯氏利用王道士敬仰的唐僧玄奘外加探知他维修莫高窟急需大洋，攻破了王圆篆的心理防线。结果是各有所得。这场“智斗”，既展现了斯氏的贪婪，也写出了王道士的狡黠。与石窟经卷在国内的悲惨遭遇相比，从客观效果出发，雒青之承认斯坦因为敦煌学做了好事、善事，同时也指出“他的考古实践毕竟损伤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他的第四次中亚之行，反映出作为一名学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迟钝，在东方民族觉醒过程中不合潮流。”

如果说《百年敦煌》把斯坦因由“强盗”还原为学者，冷静而理性地分析其成就与不足，客观评价其地位与影响的话，那么对伯希和则极尽赞美

之词——把“鼻祖”“功勋”“天才”统统加在了他的头上。

伯希和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完美得让人生疑。对此，笔者本不敢苟同，但在大量的历史实证面前，似乎又无从辩驳。

比如伯希和在敦煌创造了五个第一：

一是他最早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

二是他最早对莫高窟进行了系统的、大规模的摄影，并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画册；值得一提的是，常书鸿正是在巴黎看到这套画册之后，才矢志回国参加敦煌的保护研究工作的。

三是他为最早研究敦煌写本的人。

四是他最早为敦煌写本编目编号。

五是 he 最早也最为详尽地记录了莫高窟壁画中大量的题识、题献、榜题。

以上五项便构成了其著名的“笔记A”和“笔记B”的主要内容。无论“笔记A”还是“笔记B”，都可称做是敦煌学的滥觞。

《百年敦煌》记载了伯希和在敦煌学发展的如下“功勋”——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敦煌写本精品展，惊动了罗振玉等大学者。罗振玉相会伯希和并索要敦煌遗书有关资料，伯希和慨然相与，同时进行了畅谈，据说当时“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这就是《敦煌石室遗书》的来由。从此之后，伯罗二人关系日趋密切，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从1910年至1913年期间，伯希和从法国源源不断地给这位相识不久的中国学者寄来了包括典籍、地志、图经、星占书、阴阳书、古类书等敦煌写本的影照，这又形成了罗振玉的《鸣沙石室佚书》。伯希和不但同罗振玉，而且还同时对其他求教于斯的人都在学术上给予帮助。王国维等人就从他那儿得到了敦煌文书的抄件或照片。

伯希和还与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合作编著《敦煌遗书》二册，推动了日本敦煌学的发展。

以上史实说明什么呢？第一，说明伯希和不是“强盗”。“强盗”抢了

人家的东西，光天化日之下还敢在人家的首都堂而皇之地展览吗？斯时，无论是官方、民间、学界、媒体，都未表现出特别的义愤与反对。“强盗”云云，实际上是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特殊历史时期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的反映，是长期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与国际认知格格不入。第二，敦煌学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是在开放、共享、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的。

伯希和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他的语言天赋。伯希和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亦有可能是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除了欧洲母语外，他还精通古汉语、梵语、藏语、突厥语、蒙古语、波斯语、回鹘语、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安南语等十几种语言。

以上仅是《百年敦煌》的部分内容。书中的相当篇幅则是用来对国内外敦煌学的发生、发展及其重点人物重点作品的梳理与点评。其突出之处还在于用大量的章节与篇幅以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方式，讴歌了为敦煌保护、研究奉献了汗水、心血、青春、才智乃至生命的志士仁人，其中包括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等等。

《百年敦煌》是迄今我读到的最全面、最系统地介绍、论述、评价、宣传敦煌及敦煌学的既是学术的又是文学的著作，其意义远非某些屡获大奖而事实上又屡遭质疑的报告文学作品可比。

老实讲，我是在抗拒博弈中完成《百年敦煌》的阅读的。它给我固有的观念与认知带来了冲击与震撼。由排斥、拒绝到认知、接受，经历了很长的痛苦过程。

那么，《百年敦煌》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迪与思索呢？

其一是学术研究要不要与时俱进。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变革——从备受屈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民族觉醒、奋起救亡图存；从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今已成为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这期间敦煌学因种种非学术因素造成的偏

颇乃至失误，是否也应该进行一些矫正修复与反思呢？几乎是在藏经洞发现的同时，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抢走了大量的国宝文物——名副其实的明火执仗，入室抢劫；一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又从密室中取出这些“战利品”堂而皇之地拍卖获取天价，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斯坦因、伯希和呢？他们获取的经书、文物，同他们的著作一起，成了敦煌学主要的也是重要的源流，成为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将这二者统统称为“强盗”合适吗？在历史的天平上能平衡吗？

其二，敦煌学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敦煌学，是把它留在国内好还是走向世界好？长期以来我们对日本学者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耿耿于怀，认为是一种“耻辱”。知耻而后勇。于是国家重视，队伍壮大，学者争先，而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宣布：敦煌学回归故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啦！这当然是好事。可接下来怎么办？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我们斥巨资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建立了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目的何在？推介中国文化，增强我们的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风云际会也好，事出偶然也好，歪打正着也好，反正敦煌学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它的优势；而今要更好更大更全面地走出国门，构建和谐世界，沾沾自喜于敦煌学回归故里显然是不够的。要继续发展弘扬敦煌学，没有思维、学术、理论的创新行吗？没有对国内外敦煌学的梳理与整合行吗？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百年敦煌》恰逢其盛，应运而生；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百年敦煌》也许将成为敦煌学转折期的标志性著作。

我说的是：也许。

引 言

渺渺宇宙，茫茫星海。当距今 460 万年前南方古猿一声长啸后，作为太阳系骄子的地球，便在旋转中开始了快速构筑其人类文明的进程。

公元前 6 世纪，佛教诞生。释迦牟尼的信徒们以自我为烛，照亮了雪峰戈壁。他们穿越荆棘，在吟诵中东进。自此之后，一种震撼人心的宗教文化，与华夏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元 4 世纪，前秦苻坚迎天竺鸠摩罗什于龟兹。后秦姚兴复奉罗什为三藏法师于长安，阐经译述，皈依日众，佛教法运由此而盛。降及唐代，玄奘大师取经归自印度，博通经纶，译述愈广，佛教日益弘扬，受封几遍寰宇。佛教大盛于华夏。

公元 366 年，即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樽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

此山，指三危山，由乐樽发愿始建并由后继者相继构建佛窟的这片地域，就是举世闻名、被斯坦因称之为“亚洲的十字路口”的敦煌。